



中国近代社会  
思潮研究丛书

# 天命的没落

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

高 瑞 泉 著

唯意志论一经在中国产生，便与顺天命、灭人欲的理性专制主义相抗争。文人学士们发为歌哭，赋为风雷之文；『无欲』、『无我』的境界被一脚踢开，理想人格不再是毫无物欲的『醇儒』，纯金一样的圣贤，而是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人不应当安于天命，选择的自由在于人的意志。然而，用一个极端反对另一个极端，必然同归于谬误。唯意志论终究根治不了宿命论的痼疾，相反可能导致无政府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它们都需要非理性主义的恶性发挥。

——题记



上海人民出版社

566905 — 907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



2 020 7502 0

# 天命的没落

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

高瑞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101号

责任编辑 王鉴平  
封面装帧 任意

·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

**天命的没落**

——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

高瑞泉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75 插页 3 字数 200,000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8-01234-2/B·157

定价 4.75 元

#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编

冯 契

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鉴平 刘志琴 何兆武

张利民 胡伟希\* 高志仁\*

高瑞泉\*

[有\*号者为编委会常务联系人]

67DA06/01

## 丛书总序

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近代一百余年间，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挑战和民族危机，中国社会发生了甚至春秋战国时代也难以相比的激烈动荡和深刻变迁。这是一个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专制走向民主，由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转折时期。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中心问题，中国的思想界不断掀起轩然大波，形成了思潮蜂起、波澜壮阔的历史图卷。略举荦荦大端，其中即有进化论思潮、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唯意志论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佛教复兴思潮、科学救国思潮、平民教育思潮等等。在短短百年间，特别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的数十年间，如此多的思潮纷呈涌动，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可以说是没有前例的，它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条件下，思想的空前活跃，争鸣的空前激烈，精神的迅速高扬。就具体的思潮而言，它们可能是有得有失，有积极面有消极面，有的甚至可能是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但是，思潮蜂起的总画面表现了民族精神在寻找救国救民、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正是在这一长期艰苦的探索中间，形成了值得珍视的近代文化传统。

谈及传统，人们通常容易只理解为古代传统。诚然，中国古代有悠久的文化传统，需要我们去批判地继承，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服务。但是，构成当代人直接精神背景的，决不是原封不动的古代文化传统。古代文化中那些在当代生活中依然有生

命力的东西,大多是经过近代历史的筛选,并发生了不同程度变形的东西。中国近代是中西文化冲撞、汇合的时代,西风东渐,文化的渗入,思潮的传输,在中国这片国土上形成了既不同于古代中国又不同于近代西方的特点。即以我们前述诸社会思潮而言,它们中大部分经过了西方的媒介,但几乎无一例外都与它们在发源地时有相当的不同。中华民族历来是富于创造性的民族,近代严峻的历史条件的挑战,更激发了她的创造性。所有这一切,即古代文化传统在近代的转变,西方文化的传入及其与中国文化的融合,近代民族文化的独特创造,就构成了中国近代的文化传统。这是对当代中国人更有影响力的文化因素。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当代文化讨论中的许多问题,大多是在近代史上已经反复争论过的问题;某些当代人的思想观念、精神倾向完全可以在前几十年中找到模本,就不难理解近代文化的这种持续性、连贯性。其中,既有许多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也可以深入寻访历史发展的趋势与规律。

因此,加强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研究,把握近代文化传统,进而把握历史的流向,无论对于推动中国近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学术研究,还是作为历史的反思,给现实提供一种有益的借鉴,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在我国学术研究中还几近空白。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同意出版这套“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是很令人高兴的。

本丛书的宗旨,是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发生过重大影响的社会——文化思潮为对象,通过描述这些社会思潮的兴衰、演变、交错迭代的轨迹,提供一种研究近现代社会历史的新视角。丛书的每一部著作都对某一社会思潮中的人物、流派、思想作动态的研究,并对其社会根源、影响及教训作多侧面的理论探

索；全套丛书汇总，希望能够帮助人们达到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某种总体性理解。

收入本丛书的著作，它们所研究的，可以主要是哲学思想、或者政治思潮、或者文化、宗教思潮，即每一部著作的侧重面可能颇不相同，但作为丛书整体，强调的是社会思潮。换句话说，不管这些思潮的侧重面在哪里，它们都是对整个社会发生广泛影响的思潮，而不是只在狭窄的专业圈之内发生影响的理论。所以，收入本丛书的著作与一般的近代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将有很大的不同，它常常需要跨越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教育乃至俗文化、社会生活方式等诸多领域，从而反映出社会思潮自身的广度与深度。在方法上，本丛书注重研究在中国近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西方思想如何传入并影响中国，而中国古代传统又如何被发掘、继承及转化，从而形成的一系列社会思潮既具有时代特征，又富于民族特点。由于其中相当一部分社会思潮是在西方同类思潮的传播下发展起来的，所以为了要把握它们的近代民族特点，又需要通过中西比较的途径。我们希望借助这种研究跨度和研究方法，提高社会思潮研究的学术价值，以期引起多种学科的专业工作者的注意，同时也可以帮助一般读者对中国国情与近代传统获得进一步的认识。

本丛书的作者，多为从事中国近代哲学、思想、文化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思想敏锐、神旺笔健，学养也日臻丰厚。收入本丛书的著作多系他们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现在奉献给读书界。能够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的批评指教，并因此有助于推进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研究，是我们共同的期望。

冯 契

一九九一年七月

# 序

冯 契

中国近代遭遇了空前的民族灾难,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同时在思想领域也展开了一场伟大的哲学革命,其中包括价值观的变革。讲到价值观,便涉及人的自由以及人所创造的价值同人的本质力量(劳动能力和知、情、意等)之间的关系问题。当人们提出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和批判旧的价值观时,也就要求用一种新的态度对待物质生产能力和理智、意志、情感等精神力量。这里且不谈物质生产能力,就精神力量来说,拿中国近代哲学和古代哲学相比较,便可以看到有明显不同的态度。

中国古代哲学家讲理想人格,往往包含有贬低情、意的倾向。不论是通过克己复礼而达到知天命、顺天命的圣贤,或是通过心斋、坐忘而达到与造物者游的至人,或是通过止观双修而达到豁然顿悟的佛祖,他们的智慧都是静观的,思辨和直觉是纯净的光辉,排除了情感和意欲的色彩。这种“忘情”、“无欲”、“无我”的境界,似乎给人以最高的“受用”、“乐趣”,但宋代道学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发展到极端,却成了理性专制主义,严重地损害了人性的自由发展;因之到了近代,它就成了主要的批判对象。

从龚自珍开始,近代哲学便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人的精神力量,他推崇“心力”,“剑气箫心”增强了他的理论的感染力,竟

使得梁启超赞叹不止：“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民族面临着危机，时代充满着矛盾，近代先进思想家们通过个人遭遇和切身体验而感受到时代的脉搏，感到心中有郁结、有块磊、有不得已者而后言，于是发为歌哭，赋为风雷之文，表现了“心力”的雄伟，而使那些面壁静坐的僧侣和衍辑语录的儒生黯然失色。“忘情”、“无欲”、“无我”的境界被一脚踢开了。近代哲学家的理想人格再不是毫无物欲的“醇儒”、纯金一样的圣贤，而是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他们是多样化的，各有其面目；虽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都是要求个性解放的具有真性情的“新人”。“自由”的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不再被理解为乐天安命、逍遥无为，而是看作应该在竞争、斗争中争取的果实。“智慧”的范畴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章太炎说：“竞争生智慧，革命开民智”。所以思想不能停留于静观，理论并不是冷冰冰的概念结构，而是灌注着热情、能鼓舞人的斗志和培养人的信念，有助于革命行动的。——这就是近代的进步思想家对待人的精神力量（知、意、情等）的基本态度。

正因为中国近代哲学家在对待知、意、情的态度上和古代哲学家有此不同，所以在哲学理论上产生了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在古代，儒家的天命论占统治地位，以“遇”为命的学说也很有势力，却始终没有强大的唯意志论传统；但到了近代，却确实有了唯意志论传统，并长期形成了唯意志论与宿命论两极对峙的局面，成为行动上产生“左”的和右的错误的思想根源。这一现象虽早被人注意到了，却一直没有人作系统的考察，这是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中的一段空白。

高瑞泉同志的博士论文：《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做了前人没有做的工作，填补了这段空白。他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的发生、发展、演变及其转

入没落的历史过程，主要沿着伦理学和历史观两条线索，研究这一思潮的演变，写成这部二十万字的论著。在进行博士论文的评审、答辩时，曾得到前辈专家们的肯定评价；部分内容在报刊上发表后，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现在经作者修改后正式出版，相信它是会受到读者欢迎的。

作为这篇论文的指导教师和最早的读者，我对它所达到的成就是满意的。我以为它有一些独到之处：首先，对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作了历史的分析：一方面指出它反映中国近代政治上反封建、哲学上反天命的历史要求，因而唯意志论曾以其特殊的形式包含着相当激进的革命内容；反对以天命论为中心的旧价值观，提倡斗争和创造原则；反对正统儒学的理性专制主义和禁欲主义，提倡自由意志、自然情感，要求个性解放、独立人格；另一方面，研究的结果也表明，唯意志论本身仍然是一种理论偏颇，它并不能完全诊治宿命论的痼疾，相反可能导致无政府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它们都需要非理性主义的恶性发挥。这样的分析是比较辩证的，纠正了某些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形而上学态度。其次，对中国近代哲学中唯意志论与宿命论相对峙的客观原因作了深入考察，指出我们民族中既有长久深厚的宿命论原素，又有接受唯意志论、形成狂热的非理性运动的原素；民族生活中常常是权势者搞唯意志论，普通民众相信宿命论，由此必然引导到政治上高度集权和广泛的无政府状态两极对峙——“大跃进”和“文革”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些考察富有启发意义，也表现了作者的理论勇气。第三，作者视野比较宽广，采用了中西比较的方法，除了对一些中国哲学家的西方思想渊源作实证的研究外，还探讨了中西唯意志论的某些共同规律性与特殊性；同时，还努力拓宽研究领域，多方面地探讨了唯意志论与中国近代佛教、文学、政治思想等的关系，因而显得羽毛丰满，能广

泛引起读者兴趣。

不过,正因为涉及面广,又是开拓性的研究,论文的某些部分便难免显得粗糙,有些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索。论文宣告了“天命的没落”,但通过“超越哲学的思考”,作者得出结论说:“要根本上消除宿命论与唯意志论的对立,除了哲学健全自身、发展科学以外,必须经过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这大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却是必不可少的过程。如果我们能够在理论上保持清醒,那它也将是一个有希望的过程”。(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作者用了乐观的语气,给人指出希望;但又用了颇为犹豫的口吻:“大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多长呢?难说。对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来说,无疑只是瞬间。但对年命短促的个人来说,这“漫长”二字便令人忧郁了。我们的民族反复地陷入两极对峙的迷途而不能自拔,使得无数爱国者心有郁结。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高瑞泉同志发愤著书,他这部“述往事、思来者”的著作,其理论成就如何,将接受时间的考验,但它在“意有所郁结”的读者中会引起共鸣,则是可以肯定的。

## 目 录

|        |     |
|--------|-----|
| 序..... | 冯 契 |
|--------|-----|

|                |   |
|----------------|---|
| 第一章 异端的勃兴..... | 1 |
|----------------|---|

|                     |   |
|---------------------|---|
| 一、历史 and 价值的冲突..... | 1 |
|---------------------|---|

|                |   |
|----------------|---|
| 二、历史主体的觉醒..... | 8 |
|----------------|---|

|                |    |
|----------------|----|
| 三、道德自律的权威..... | 27 |
|----------------|----|

|               |    |
|---------------|----|
| 第二章 渴望自由..... | 42 |
|---------------|----|

|                      |    |
|----------------------|----|
| 一、一个悲观主义者的追求与取舍..... | 43 |
|----------------------|----|

|                       |    |
|-----------------------|----|
| 二、从历史进化论到“俱分进化论”..... | 58 |
|-----------------------|----|

|                         |    |
|-------------------------|----|
| 三、“道德革命”与“革命道德”二重奏..... | 77 |
|-------------------------|----|

|                 |    |
|-----------------|----|
| 第三章 走向历史深处..... | 98 |
|-----------------|----|

|                   |    |
|-------------------|----|
| 一、哲学：主流在这里超拔..... | 99 |
|-------------------|----|

|                   |     |
|-------------------|-----|
| 二、文学：一片新的开阔地..... | 119 |
|-------------------|-----|

|                |     |
|----------------|-----|
| 第四章 末流与困顿..... | 148 |
|----------------|-----|

|                  |     |
|------------------|-----|
| 一、玄学派的亢奋与悲凉..... | 149 |
|------------------|-----|

|                    |     |
|--------------------|-----|
| 二、批判的时代与时代的批判..... | 171 |
|--------------------|-----|

|                |     |
|----------------|-----|
| 三、抨击不等于终结..... | 192 |
|----------------|-----|

|                |     |
|----------------|-----|
| 第五章 反省与超越..... | 201 |
|----------------|-----|

|                    |     |
|--------------------|-----|
| 一、中西近代意志主义异同论..... | 202 |
|--------------------|-----|

|                       |     |
|-----------------------|-----|
| 二、历史的重负：突出两极对峙之路..... | 218 |
|-----------------------|-----|

三、论规律的辩证本性与主体的选择权能 .....247

跋 .....265

# 第一章 异端的勃兴

---

## 一、历史和价值的冲突

本书将探讨的唯意志论是一个难以在中国古代寻访其先世谱系的哲学—文化思潮。它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勃起，并前后绵延历百年之久，其主要原因应当从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变迁过程中去寻找。同时，正如一切精神的运动总是它自身的运动，唯意志论又是对前一时代文化的一种回应与逆反。所以我们还要考察这一思潮背负的哲学—文化遗产。

中国社会经过数千年农业经济—封建制度相对平稳的发展以后，到近代终于开始解体，逐渐进入了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革命时期。这是一场亘古未有的变革，但它最初对中国人来说却是被动的、不自觉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当中国之船驶至近代的地平线时，正处于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的双重夹击之中。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人一直被封闭在封建帝国、宗法制度和自以为位居天下之中心的迷梦中间；高度专制集权的官僚政治，其腐败已病入膏肓；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濒临破产，农民起义不断削

弱着地主阶级统治的根基；从官场到士人普遍的道德衰颓；按照祖宗成法的统治，不允许任何越出传统规范的言行，这一切几乎使民族生机和创造精神渐灭无余。史家称此为衰世。龚自珍曾将其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sup>①</sup>如此衰朽的封建帝国，不仅无法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列强在全球争雄，而且它首先总是顽固地阻碍乃至扼杀内部资本主义因素的自然发展，因此它几乎难以在一个充满竞争风险的世界里生存。历史表现出巨大的惰性。

被封建统治阶级用作工具的正统派儒学，却是维系历史传统的力量。从孔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开始，天命论和权威主义（独断论）即成为儒家传统；中经董仲舒等汉儒将其发展为天人感应、天人相通的理论；宋代理学家又摒弃了其中粗陋迷信的成份，以先验主义的天理论与复性说为核心，形成了相当精致的理论体系。这一派儒学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发展当然有其不容抹煞的贡献，但是，借助灵化的方式——天命论，为其物化的基础——宗法制度或礼教——辩护，则是其一脉相承的主旨所系。天命论在历史和道德的领域又两翼展开为天命史观与道德宿命论。前者从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经董仲舒“王者承天命以从事”，到宋儒演变为天理史观：历史不过是理或太极的流行，它表现为帝王中心论和历史循环论，在朱熹那里则是历史退化说（三代天理流行，三代后人欲横流）。后者从唐李翱以来则以逐渐圆熟的“复性”说为其表现形态。

天命论在程朱理学的展开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价值体系。它以独断论的“天人合一”为鹄的，以非功利主义的伦理理性为核心，以泯灭个性的“无我”论为手段。按照朱熹对“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解释，人的本性是天所赋予，因

①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7页。

而是预定而不可更改的。“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sup>①</sup>必然之理与当然之则是统一的，自然规律与社会规范是合一的；按照社会规范来教化人，就能使人性复归于天理，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域。把自然与人的统一（天人合一）作为理想本来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相对于西方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优点之一。但是理学家把社会规范（人道）与必然规律（天道）在“天理”的规定中完全等同起来，而“天理”不过是纲常名教的形而上化，那实际上是宣布纲常名教、宗法制度是绝对合理、神圣不可侵犯的。从近代人文主义的立场看，这恰恰是反人道的。正统派儒家对人格构成中的理性因素极为重视，他们都坚持道德可以通过教育来培养，圣人可以通过学习来造就，对道德行为的自觉原则有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是他们往往否定人的感性要求，贬抑人的意志、情感、欲望，从理性统率意志、情感而走到反功利主义。所以理学家大多主张“无欲”、“忘情”，认为只要“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达到“己与理一”，就会自动地窒息人欲。——这是用自觉原则代替自愿原则，用伦理理性吞并人的感性要求，用理智消弭人的情感与意志。他们把“天理”叫做“公”，也就是说以宗法制度、纲常名教为“公”；而把人的感性活动、物质生活的基本欲求叫做“私”。譬如朱熹就说：“如饥饱寒暖之类，皆生于吾身血气形体，而他人无与，所谓私也”。<sup>②</sup>他们从感性活动的个体性特点推论出物质欲求是“私欲”的结论，又从个体（我）即“私”得出“无我”的原则，这样就从整体上为泯灭个性的说教提供了理论依据。

对这样一套为封建制度辩护的理学教义，历代都有哲学家

① 朱熹：《四书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页。

② 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提出不同程度的批评。在经历了一场天崩地析的大变局以后，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们痛定思痛，深刻地觉悟到必须清算宋明理学，否则社会就无以进步。他们反对天命史观与道德宿命论，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王夫之提出了理势合一的历史观，认为“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就是说历史规律体现在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中，而“天视自我民视”，历史必然性又只有到民众的生活、意愿中去寻找。一切被人民恒久地接受的东西背后，都存有某种历史必然性。他反对“复性”说，提出“性日生而日成”的理论，赋予主体意志以某种道德选择的自由。他和黄宗羲都从理性主义原则出发，主张德性的培养要知、情、意的统一，自觉原则与自愿原则的统一。与此相连，黄宗羲认为“养气即养心”，王夫之说“成身”与“成性”相统一，意即坚持灵与肉、理性与感性都是统一的人格中不可或缺的方面。针对理学家所谓“大公无私”的说教，黄宗羲提出了“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顾炎武则断言“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学，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sup>①</sup>王夫之则更明确地断言，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没有离开人欲的天理；所以天理应当是人们食色等自然欲望得到合理的满足。总之，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们肯定人的个体之“私”，肯定人的自然之“欲”，都是合理的。清代大哲学家戴震等继续对理学提出批判，他主张人性本来包含有“欲”、“情”、“知”三方面，“而理者存于欲者也”；<sup>②</sup>精神始于肉体，“有血气始有心知”，所以真正的德性是人性的圆满发展，离开人的自然情欲决无所谓德性的完善，而理学家的天命论、“存天理，灭人欲”说教是以理杀人！

但是，显而易见，这群卓越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并未完成批判

①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一。

②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